第一章 先秦时期

山西地方史的开端，应肇始于山西境内原始人类的出现，而山西移民史则应溯源至原始族群的形成及定居生活的开始。先秦时期山西地区人口迁移的演变过程按年代可分为两个阶段，即晋国建立之前的原始文化时期与晋国及三晋时期，而晋国的创建是从唐叔虞受封的古唐国说起。很显然，前一阶段的绝大部分时间属于考古文明时期及上古传说时代。在这一相当漫长的时间里，由于缺乏确切的文献记录，我们只有依据现有考古发掘成果及英雄传说，对山西境内远古先民的分布以及迁移大势作概括性的描述。

第一节 原始文化时期

一、山西原始文化遗址与先民迁徙大势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黄河是山西西部及南部与邻省的天然界线。黄河流域曾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摇篮”,随着考古发掘及研究的深入,文明起源多元化的观念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古代黄河流域（主要指中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地区）是远古华夏族最重要的、最集中的聚居区之一，这其中包括山西的南部。建国以来，山西境内大批原始文化遗址的发现，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古代先民在三晋大地上创造的原始文明，也为我们探寻先民早期定居及迁移状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迄今为止，山西境内所发现石器时代遗址的数量在全国各省区中可谓独领风骚，仅从 1949 年到 1973年，在山西全省范围内就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 10 余处，200 多个地点 新石器时代遗址 300 余处。① 又根据山西省文物局 1988 年编制的《文物普查成果统计表》显示，山西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与地点总计达 1316 处，广泛分布于山西各地。② 现将山西境内解放以来发现的重要文化遗址排列成表：③

遗址名称	文化类型	年　代	所属地区
西侯度遗址	旧石器	更新世初期	运城芮城
匼河遗址	同　上	中更新世早期	运城芮城
南海峪遗址	同　上	中更新世	运城垣曲
丁村遗址	同　上	距今20万年	临汾襄汾
里村西沟遗址	同　上	距今20万年	临汾曲沃
南梁沟遗址	同　上	晚更新世早期	运城新绛
许家窑遗址	同　上	距今约10万年	雁北阳高
峙峪遗址	同　上	距今2.8万年	雁北朔州
下川遗址	同　上	晚更新世后期	晋东南沁水
鹅毛口遗址	新石器	仰韶文化早期	雁北怀仁

①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建国以来山西省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成果》，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 年)。
② 转引自杨纯渊：《山西历史经济地理述要》第 24～26 页。
③ 表中遗址选取据《建国以来山西省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成果》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资料(转引自《山西历史政区地理》)，并参考李壮伟：《山西旧石器的发现与研究》(《山西大学学报》1982 年第 3 期)。

西王村遗址	新石器	仰韶文化晚期	运城芮城
东庄村遗址	同 上	仰韶文化早期	运城芮城
梁 村 遗 址	同 上	仰韶文化晚期	晋中祁县
下马村遗址	同 上	庙底沟文化	运城垣曲
葛赵村遗址	同 上	仰韶文化晚期	运城平陆
道觉村遗址	同 上	同 上	临汾洪洞
高 堆 遗 址	同 上	同 上	临 汾 市
西阴村遗址	同 上	同 上	运城夏县
垤上村遗址	同 上	同 上	临汾侯马
新成庄遗址	同 上	同 上	临汾襄汾
盘南村遗址	同 上	同 上	运城平陆
陶 寺 遗 址	同 上	龙山文化时期	临汾襄汾
南礼教遗址	同 上	同 上	运城芮城
光 社 遗 址	同 上	龙山文化晚期	晋中太原
峰台梁遗址	同 上	同 上	忻州五寨
南梁上遗址	同 上	龙山文化时期	雁北大同
东下冯遗址	同 上	商 代 前 期	运城夏县
合 计			27

在上表所列重要文化遗址中，运城地区占 11 个,临汾地区占 7 个,雁北地区占 4 个,晋中地区有 2 个,忻州与晋东南地区各有 1 个，吕梁地区空缺。虽然这一统计不尽全面，但我们从中依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从全国范围来看，山西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众多，尤以旧石器时代遗址为典型，说明在那遥远漫长的年代山西地区原始族群的繁盛。更重要的是，这种繁盛生生不息，一直延续至有文献记载的时期。

其次，古文化遗址很大程度上集中于运城与临汾两个地区，这

两个地区又习惯合称为晋南地区，这一区域不仅在数量上拥有了将近 70% 的遗址，而且其代表意义也是无与伦比的。如西侯度遗址被考古学家认定为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文化遗址之一，“西侯度遗址发现的意义是重大的，它证实了在我国土地上，远在更新世初期就有人类居住着，并创造了人类曙光时代的先声文化，从而把我国的历史又推早了一个相当漫长的阶段”。① 晋南地区无疑是山西境内原始文化时期最先进、人口最集中的地区。

再次，地处最北边的雁北地区拥有的文化遗址数量仅次于运城和临汾，而且具有很明显的连续性，如‘峙峪人’极可能为‘许家窑人’的后代。② 同时山西各地区原始文化的发展并非互不相关，考古学家们认为“：从现有资料观察，山西北部（大同、朔县［今朔州市］、宁武）、西部（河曲、保德、离石）和东部（寿阳、平定）的石器，晚于纵贯南北的汾河沿岸的丁村文化，而丁村文化又晚于南部（芮城、平陆、垣曲）的石器。这一现象很可能说明旧石器文化在山西是由南向北发展的。’③ 如果这种发展存在，那么导致这种文化发展、扩散重要而直接的因素无疑是原始族群的迁移，尽管我们难以推断这种迁移确切的规模。洪荒初辟，草莽榛榛，原始先民们往往将迁徙作为抵御外来侵袭和寻找最佳生存环境的主要方式。然而“：迁徙往来无常处’④ 的生活方式不利于原始文明的积累与发展，定居对于原始农业生产的进步更是至关重要。原始文化遗址的考察可以使我们看到古代先民从迁徙到定居，从定居到创造早

① 贾兰坡、王建：《山西旧石器的研究现状及其展望》，《文物》1962 年第 4、5 期合刊。
② 贾兰坡、盖培、尤玉柱：《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 年第 1 期。
③ 贾兰坡、王建：《山西旧石器的研究现状及其展望》，《文物》1962 年第 4、5 期合刊。
④ 参见《史记·五帝本纪》。

期农业文明的艰难历程。

二、上古传说中与迁徙有关的地名

传说中‘三皇五帝’的记载虽然文献不足征,但他们的行踪却常常被落实在明确的地点，而集中于山西临汾、运城两地区内，这正好与考古发现的成果相印证。以《史记》三家注(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为例,下面试将《五帝本纪》、《夏本纪》的注解中涉及山西的地名稍作归纳,以帝王先后为序(《禹贡》内容除外)

(一)帝尧

1. 平阳《正义》“:徐广云:‘号陶唐’。《帝王纪》云:‘尧都平阳,于《诗(经)》为唐国。’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晋水’。《括地志》云:‘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平阳河水一名晋水也。’”

(二)虞舜

1. 舜都《集解》“:皇甫谧曰:‘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阳,或言潘。潘,今上谷也。’”《正义》“:《括地志》云:‘平阳,今晋州城是也。潘，今妫州城是也。蒲阪，今蒲州南二里河东县界蒲阪故城是也。’”

2. 妫汭《集解》“:孔安国曰:‘舜所居妫水之汭’”《索隐》“:……皇甫谧云:‘妫水在河东虞乡县历山西。汭,水涯也,犹洛汭、渭汭然也。’”《正义》“:……《括地志》云:‘妫汭水源出蒲州河东南山。’许慎云:‘水涯曰汭。’案:《地记》云:‘河东郡青山东山中有二泉,下南流者妫水，北流者汭水。二水异源，合流出谷，西注河。妫水北曰汭也。’又云:‘河东县二里故蒲坂城,舜所都也。城中有舜庙,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外有舜宅及二妃坛。’”

3.虞《索隐》“：虞，国名，在河东大阳县。舜，谥也。”《集解》：“皇甫谧曰：‘舜嫔于虞，因以为氏，今河东大阳县西山上虞城是也。’”

4.蒲坂《正义》“：蒲州河东县本属冀州。《宋永初山川记》云：‘蒲坂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

5.历山《集解》引郑玄曰“：在河东。”《正义》引《括地志》云：“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亦名首阳山，亦名蒲山……此山西起雷首山，东至吴坂，凡十一名，随州县分之。历山南有舜井。”

6.陶城《正义》“：《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历山不远。或耕或陶，所在皆可，何必定陶方得为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

（三）禹

1.太原《正义》引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帝夏禹都，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晋水。”

2.平阳、安邑《集解》“：皇甫谧曰：‘（禹）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

太史公司马迁曾云“：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① 也就是说明这些地方当时即有较多古文化遗存。如果文献中所载“都”可以理解为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那么“都”的转移必然伴随一定数量原始族群的迁徙，显然，即使在传说中我们仍然可以觅到先民在山西这片土地上迁移的踪影。但我

① 《史记·五帝本纪》。

们必须承认，原始文化遗址所标示的时段与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年代之间有着难以弥合的空白。早在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已在山西广大地区繁衍、生息，在绝大部分地区都留下了他们生活的遗迹。但我们所能掌握的文献资料均以华夏族的发展为中心，就山西地区而言，华夏族生活区域是自南向北逐步推进的，晋国几乎是在所谓“戎狄”的包围中慢慢发展起来。显然，那些曾在原始遗址中居留的先民既有华夏族的先辈，也有其他少数民族的祖先。山西地区的原始文化同样是各个民族的先辈共同创造的。

第二节 晋国早期历史中的迁移问题

从现存古文献分析，山西地区开发的“筚路蓝缕”时期应自商周封邦建国之时开始。这样，先秦时期山西的历史即可视为晋国以及三晋(韩、赵、魏)的发展史。人口的迁移在这一发展史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如从古唐国的出现，一直到三家分晋，华夏族势力在山西境内的拓展，以及“夷狄”部族的退却都伴随着人口的迁移。在上古时代，对某一区域的控制权往往掌握在武力及人口数量占优势的部族。晋国作为华夏（汉）族的代表，以山西南部为根基，通过战争、移民等方式，逐步向中、西、北部推进。而原来遍布于山西各地的所谓‘戎狄’部族，则逐步退缩。可以说，没有各族人口的往来迁徙，也就不会有各部势力的消长与控制地域的伸缩。

一、古唐国的变迁与部族迁徙

晋国的历史一般从唐叔虞受封说起。事实上，早在唐叔虞受封之前，在今山西地区已有不少小的方国，如虞、芮、黎、霍等。近

年又有学者根据甲骨刻辞确定了一些当时居住于山西境内的国族，如先、丕、缶、亘、基、重等①。然而我们对这些小国的了解，大都只限于它们的名称，晋国发展的历史首先便是吞并这些国族的历史。晋国的历史要从古唐国说起，而它的变迁与远古时期部族的迁徙密切相关。

由于流传史料的奇缺，古唐国的历史扑朔迷离，疑窦丛生，如古“唐”字内涵的阐释歧义最多，古今众多的学者参与了这桩公案的讨论，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的结论，其中代表性的意见有：

1.《史记·晋世家》云：“(周)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

2.《史记正义》引李泰《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至周成王时，唐人作乱，成王灭之而封大叔，更迁唐人于杜。”②

3.西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县”下云：“故《诗(经)》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

4.《诗经·国风》“唐谱”郑玄笺云：“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曰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③

上述各家的诠解，其实围绕着三种“唐”的概念：一是传说中帝尧裔子所居的古唐国，二是周成王封予叔虞的唐国，三是作为唐国中心的唐城的位置。这三种概念虽然紧密相关，但如果完全混为一谈，那必定造成各持一端，歧义叠出。很明显，学者们争论的焦

① 李孟存、常金仓：《晋国史纲要》第一章《西周时期的晋国》，第 5 页。又参见张亚初：《殷墟都城与山西方国考略》，《古文字研究》第十辑。
② 见《史记·晋世家》引。
③ 《毛诗正义》卷六，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 年。

点在于第三种概念。从班固起，学者们就开始了寻找传说中唐城地望的工作，而问题也由此变得错综复杂。最有代表性的意见大致有两种，一是晋阳说，一是绛州翼城说。其实，对于两种说法较为合理的解释应从上古部族迁徙的角度出发。

《史记·五帝本纪》云："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据此，陶唐为帝尧国族的国号。《左传·哀公六年》引《(尚书)夏书》云："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可见，在陶唐氏势力兴盛之时，其涉及的区域是相当广袤的，古唐国应是他们活动的中心区域。在陶唐氏的权力被剥夺之后，居住于古唐国的帝尧后代们似有被迫迁徙之举，范氏便是其中的代表。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晋卿范宣子(士匄)自述其家史云：

> 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也记述了晋国太史蔡墨对范氏之族变迁历史的回顾：

> 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飨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

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

两段珍贵的口碑资料表述的核心都是范氏家族的历史，然观其细节却有所不同。迁徙的发生是共认的，但时间上有前后之别。蔡墨所云刘累迁离是在夏后之世，迁入地点为鲁县（传说即今河南省鲁山县）。而范宣子所述“在周为唐杜氏”与之显然有些距离，后世学者努力为之弥缝。如《括地志》在复述蔡墨之语后又云：“夏后盖别封刘累之孙于(大)夏之墟，为唐侯。至周成王时，唐人作乱，成王灭之而封大叔，更迁唐人子孙于杜，谓之杜伯，即范(氏)匄所云‘在周为唐杜氏’也。《地记》云：‘唐氏在大夏之墟，属河东安（邑）县。今在绛城西北一百里有唐城者，以为唐旧国。’”① 事实上这种努力的效果并不理想，新的歧误又被制造出来。《左传·昭公元年》载子产曰：“昔高辛氏(即帝喾)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商周，其季世曰唐叔虞……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可见，《括地志》的作者是将两种说法进行了编撰，将刘累的子孙等同于实沈，确实勉为其难。

如果将古唐国与唐人的历史单一化、固定化，那么这些远古流传下来的口碑资料很难得到合理的解释。众所周知，历史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其过程是多元复杂的。从人口迁移的角度上讲，上古时期“迁徙往来无常处”② 常常是一种无法选择的生活方式，在我们考订远古时期人们的居留区域时，更无法忽视这一点。当我们用部族迁徙的观点来诠释古唐国的历史时，貌似矛盾的资料就

① 《括地志》卷二“绛州翼城县”下，参见《史记·晋世家》引。
② 《史记·五帝本纪》。

成为有价值的佐证。首先，古唐国中陶唐氏后裔并非刘累一支，在夏后之世，后裔族有迁离唐国者，刘累为其代表，这一族至迁人地(如鲁县)后,并未从此停止移徙,在商朝时又依附为豕韦氏。《诗经·周颂·武》曰:"胜殷遏刘,耆定尔功。"此"刘"极有可能为刘姓陶唐氏的后裔。①周朝建立后,又被迁至杜(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南),晋国兴盛之时，这一家族又回到了今山西地区。其次，在古唐国的发展中，有迁离者，也有迁人者，子产所云实沈的迁入即为其证，"唐人是因"正是说明了居留于古唐国的先民是各种外来移民的组合，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他们最后一位首领名叫唐叔虞，周成王所封大叔正是继承了他的名号。

在范氏之外，古唐国的发展中是否还有其他部族迁出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找寻的线索还在于"陶唐氏"这一名号:"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②据此,远古族群名号又与职守相关，"陶唐氏"即应为当时专掌制陶或制陶水准最高的一个部族。现代考古发掘证明：早在仰韶文化时期，陶器已为原始人类使用的主要工具之一，而在山西，仰韶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和汾河下游的台地上。③《史记·五帝本纪》曾载虞舜"陶河滨",李泰《括地志》释其地望云:"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历山不远，或耕或陶，所在皆可，何必定陶方得为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李泰的推断是合乎情理的。将考古发掘实物与文献相互参证，如今学者们大多支持古唐国在今晋南之说，那么其他关于唐国的记载又如何解释呢？这也应与古唐国部族的向外迁

① 见李平心:《李平心史论集·文史拾荒录·周伐商唐新证》,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②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③ 参见《建国以来山西省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成果》一文,《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移与流播有关,其中最著名的说法即为“晋阳说”。

从班固著《汉书》之时起,许多著名的学者力主此说,就连倾向于“晋南说”的《括地志》也不得不列出晋阳唐城,取两说并存的态度“: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城记》云尧筑也。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晋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即燮父所徙之处。””① 此故唐城在当时定为众所公认的古城遗址。它极有可能是北迁陶唐氏后裔所建“北唐国”的中心。古本《竹书纪年·周纪》载云“:北唐之君来见,以一骊马是生绿耳。”②

除晋阳而外,先秦时期在今山西以外的一些地方也有“唐”的名号,如《春秋经·隐公二年》云“:秋八月庚辰,公(鲁隐公)及戎盟于唐。”此“唐”即为鲁国棠邑,在今山东省金乡县东。显然,此“唐”地与晋国相去甚远。又《太平御览·州郡部》引《帝王世纪》云“:帝尧氏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是也,尧山在焉。唐水在西,北入唐河。南有望都县山,即尧母庆都之所居也。”③ 此处所谓“中山唐县”位于今河北唐县东北。这些名“唐”之地是否与陶唐氏及古唐国后裔转迁的轨迹有关呢?古代不少学者已有这方面的推测,虽无多少文献可征,但似乎不能完全排除这方面的可能。这样“,唐”不仅仅是一个地望的名称,而且可能是一种由部族迁徙而引起的上古文化现象了。

二、故绛与新

晋国最著名的两个首都是所谓“故绛”和“新绛”。然而我们在文献中看到晋国最早的都城是“翼”。在晋国发展的过程中,引起

① 《括地志》卷二“并州晋阳县”下。
② 参见《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③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州郡部一·叙京都上》,中华书局 1960 年。

其国内人口变动的主要因素之一是都城的移动。当我们讨论晋国都城的时候,首先有必要廓清当时人们关于“都”的概念。《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云:

> 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

杜预注曰:“《周礼》四县为都,四井为邑。然宗庙所在,虽邑曰都,尊之也。”“邑”应是晋国人所建立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居留区,“邑”与“都”的惟一区别就在于有无宗庙的供奉,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讨论晋国早期都城的变迁特别重要。

“翼(今临汾翼城东南)”是晋国第一个出名的都城,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史记·晋世家》云:“翼,晋君都邑也。”司马贞《史记索隐》云:“翼本晋都也,自孝侯已下一号翼侯,平阳绛邑县东翼城也。”晋文侯以后,由于宗室势力的增长,晋国政局趋于动荡。成师被封于曲沃(今运城闻喜东北),由于“曲沃邑大于翼”,从而使矛盾更加尖锐,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我们在史书记载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幕①。这场争斗终以曲沃一方的胜利而告终。

> (晋侯缗二十八年,公元前 679 年)曲沃武公伐晋侯缗,灭之,尽以其宝器赂献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于是尽并晋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号晋武公。晋武公始都晋国,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②

① 《左传·桓公二年》。
② 《史记·晋世家》。

从此我们可明确得知：至晋武公之世，晋国的首要都城仍然是翼。直到晋献公八年（公元前 669 年），晋国迁都于绛，即所谓“故绛”（今临汾翼城城关）。《史记·晋世家》载：

> （献公）八年，士蒍说公曰：“故晋之群公子多，不诛，乱且起。”乃使尽杀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绛，始都绛。

导致晋献公迁都的首要因素是已废王室势力的威胁，新都原本为一个名叫“聚”的邑，改名为“绛”。《左传·庄公二十五年》载云：“晋士蒍使群公子尽杀游氏之族，乃城聚而处之。冬，晋侯围聚，尽杀群公子。”司马贞《史记索隐》注云：“《春秋》庄（公）二十六年《传》‘士蒍城绛’是也。杜预曰‘今平阳绛邑县’。应劭曰‘绛水出其西南’也。”自此，翼作为都城的地位完全被剥夺，相反，曲沃作为新晋公的发祥地，甚至维持着“都城”的地位。晋献公强调“曲沃吾先祖宗庙所在”，故遣太子申生居曲沃。士蒍曾因此叹息道：“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焉得立！”① 显然，此处所云“都城”即指曲沃，它完全符合古人所定都城的标准。据此可知，在当时晋国人的观念中，都城并非一处，晋公所居与宗庙所在并不一定相同，而两者都可称为都城。

晋国早期都城故绛今天的地理方位，是史学家们特别关注的问题。近年的考古发掘的成果为此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这主要是天马——曲村遗址的发掘：“天马——曲村遗址规模宏大，包括墓地在内，其总面积几达郑州商代遗址或殷墟遗址之

① 《左传·闵公元年》。

半，等于西安沣西、沣东二遗址之总和，超过北京琉璃河燕国遗址两倍以上，是目前发现全国最大的西周遗址，而晋侯陵园恰在遗址正中。经过 80 年代与 90 年代 10 多次发掘,已经证实此遗址是以晋文化为主，其年代贯串晋国始终，而以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最为繁盛。今又有诸多晋侯埋葬于此，更确凿无误地证实此处是早期的晋都 ”。① 据此,有考古学家主张“: 综上所论,晋自叔虞封唐，至孝侯徙翼十二侯，又武公代晋至景公迁新田九公，历时共 370 余年，皆立都于绛，即史学家所称之故绛，亦即今翼城县与曲沃县交界处之天马 ——曲村遗址。”②

天马——曲村遗址成果的意义是重大的，将其定为晋都故绛也是有充分根据的，但以此断定从唐叔虞到晋景公，晋国从未有迁都之举则是有欠审慎的。我们从上面的分析已经明确，当时晋国人“ 都城 ”的概念有特殊意义,所谓“ 都城 ”并非都是晋公所居之处，而多数古今学者孜孜以求的只是这一意义上的晋都。考古发掘存在自身的局限性，无法否认文献记载的真实可靠性。迄今所发现的天马—— 曲村遗址总面积约 1000 万平方米,它在历史上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较合理的解释应为：在晋公迁居故绛之前,晋国的疆域并不大,公侯家族所居之“ 邑 ”面积也较小,因而所谓 “ 都 ” 城的迁移难度并不很大，规模与距离也有限。引起较大规模人口迁移的都城迁移是发生在晋景公年间的迁都新田。我们并不十分清楚晋国迁都的具体原因，只是晋国君臣在决定新都位置之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左传 · 成公六年》载：

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 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

① 见邹衡:《论早期晋都》,《文物》1994 年第 1 期。
② 见邹衡:《论早期晋都》,《文物》1994 年第 1 期。

而近盐,国利君乐,不可失也。”……(韩献子)对曰:“不可偏也。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觏。易觏则民愁,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沉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泽林盐,国之宝也。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贫,不可谓乐。(景)公说,从之。夏四月丁丑,晋迁于新田。”

迁至新田的晋都仍名为“绛”,通称“新绛”。从韩献子的意见中,我们知道,晋国君臣对新都的抉择主要是出于对自然环境的考虑。杜预注曰:“郇瑕氏,古国名,河东解县西北有郇城。”① 即在今运城地区盐池附近。这里虽有池盐资源,但由于地下水位较高,长期居住易染疾病;另一方面,土层太薄也不利于农业生产,对于以农立国的华夏族小国也是十分不利的。1957 年,在今天的山西省侯马西北牛村附近发现了春秋中晚期的古城遗址,它位于汾河、浍河汇合处的三角洲上。根据文献及其他实物的分析,专家们认为这显然就是晋国晚期的都城新田。② 此时,晋国正处于鼎盛时期的最后阶段,居住于都城的人口一定较多,迁入地又为新辟之地,因此这次迁移的规模较大,但因两地距离很近,迁移的完成并不困难。

三、晋国早期疆域的开拓

周成王封予叔虞之“唐”作为晋国的前身,关于它面积的最早记录便是《史记·晋世家》所云“方百里”。根据文献资料,直到东周

① 《左传·成公六年》杜注。
② 《晋国史纲要》第十二章《商业的繁荣和城市的兴起》,第 206～207 页。并见《1959 年侯马“牛村古城”南东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60 年第 8、9 期。

初年,晋国只是当时北方众多小诸侯国之一。《国语·郑语》载史伯言云。

> 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

这就是晋国强大之前面临的时代环境，要想在这林立的小国中异军突起，绝非易事。当时晋国的大臣也不得不承认："……今晋国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国在侧，虽欲纵惑，未获专也。"① 晋国的发展首先是消灭四周的姬姓小国，较早被灭的有荀，时间是晋武公三十九年(公元前 677 年)："晋武公灭荀，以赐大夫原氏黯，是为荀叔"。② 晋国取得较大发展是在晋献公时期，他在位期间晋国较大的军事活动有：

1. 晋献公十六年（公元前 661 年)："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为太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③

2. 十九年(公元前 658 年)："(晋献公)使荀息以屈产之乘假道于虞。虞假道，遂伐虢，取其下阳以归"。④

3. 二十二年(公元前 655 年)："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

① 《国语·晋语一》郭偃语。
② 《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晋纪》。
③ 《左传·闵公元年》。
④ 《史记·晋世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